

民国总统自叙

一世怪杰的皇帝梦

袁世凯

Yuan
Shih
Kai

民国何在，
总统何为？

家书，手札，密电，日记，诗文……

在总统自叙中回到历史“现场”

窥探民国

李翠芳 选编

袁世凱
袁世凱
袁世凱

袁世凱

HUOPI
Shih
Kai

國際何世凱

國際何世凱

THE HONG KONG,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民国
总统
自叙

袁世凯

Yuan Shih Kai



李翠芳 选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袁世凯 / 李翠芳编.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民国总统自叙 / 石钟扬主编)

ISBN 978-7-5399-7593-1

I. ①袁… II. ①李… III. ①袁世凯 (1859~1916)
—传记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6642 号

书 名 袁世凯

主 编 石钟扬

编 选 李翠芳

责 任 编 辑 刘 佳

装 帧 设 计 周伟伟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华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593-1

定 价 3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统何为

——《民国总统自叙丛书》总序

石钟扬

“鞑虏易驱，民国难建。”

此非但史家之高论，亦乃残酷之事实。

辛亥革命最响亮的口号是：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前四字言破坏，锁定革命对象；后四字言建设，标示革命前景。“驱除鞑虏”，说白了就是去驱满清专制统治者，而非世俗所云杀尽满人，然其变政治革命为民族革命，扩大了统战阵线，缩小了打击目标，立即成为“全国一致信服的意志”，令广大民众的积愤找到了喷射口。终是满清王朝气数已尽，西太后与光绪帝相携入土后，清廷只剩几个孤儿寡母和昏聩糊涂的大臣，守制无方，改革无量。1911年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未经摧枯拉朽之力，它就土崩瓦解。虽说是千年之帝制一朝改弦易辙，并未大动干戈，涂炭生灵。皇室得优待而和平退位，较之此前此后以人头换王位都来得文明，故曰“鞑虏易驱”。

那么民国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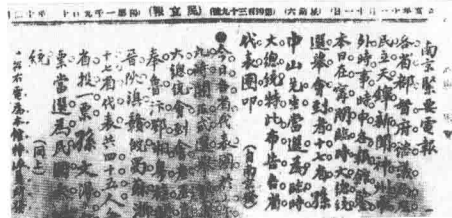
辛亥革命与民国成立至今皆逾百年，从1912年到1928年为北洋时代，前后换了13任总统（包括临时总统，临时执政，摄政内阁，大元帅等）。从1928年到1949年为蒋氏时代，到1975年去世，蒋介石做的是终身总统。蒋经国接任到1987年7月14日宣布解除党禁报禁，几经努力才创建了个“台湾模式”。百年沧桑，“民国”建成了么？史家的答案是：四不像！

二

民国何似？

孙中山是民国的总设计师。辛亥革命刚有点眉目，实力优于威望的黎元洪与威望高于实力的黄兴在排座次上闹了两个星期的哑剧，让孙中山从美国打工场兼程赶到上海码头。史家有云，黎、黄二帅得一即可安天下，不幸两人相持不下，孙中山即以绝对优势，当选了民国第一任临时

大总统,时年46岁。一向与孙中山不睦的章太炎说,这位置“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言下之意,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孙中山。然而章疯子忘了“论革命历史,论海内外声望,论建国学



1911年12月30日,《民立报》刊载了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的电报稿

理,则应属孙文”。孙中山凭此三条当选。当选之后对民国影响至大的自然是他的“建国学理”。孙初抵上海时,革命军粮草俱乏,时人风传他带回巨款,足解燃眉之急。当中外记者以此相询,孙答:“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精神耳!”

此革命精神即是金不换的“建国学理”。有别千年帝制的“民国”无有学理,焉能建成?

孙中山建国学理之精髓在“三民主义”:民生、民族、民权。在驱除鞑虏时,民族主义为首选;救民于水火之中,则民生主义为当务之急;而建立民国确立国体,则以民权为立国之本,以民权主义内保民生,外争民族地位。民权归根到底是民治,是法治,是三权(行政、立法、司法)分立,再加考试、监察五权独立,同时又有四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由人民掌握)制约的宪政。

凡此种种,皆缘孙氏以美为师:“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我国他日之模范。”亦即林肯所谓“民有、民治、民享”是也。

近代中国既无先进的生产力,也无先进的文化,它是以落后挨打的身份起步现代化的。如果说魏源之“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张之洞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云云,启动的是“洋务”,是科技的“四个现代化”;那么孙中山追求的共和制,给力的是“政务”,是“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的现代化。没有“第五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就难以实现,即使实现了也会变成一摊烂泥。可见孙中山的宪政设计与尝试是何等重要。其“建国学理”并非一次完成,也非一成不变,然其初衷大抵如上所述。秉此初衷,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有誓词: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

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此誓词之精义有三：其一，民国乃有别满洲专制政府，是以民、民意为宗旨的民治政府；其二，临时总统制天职是为国为民服务，既非终生制，也非一党专利，完成使命即可解职；其三，令满清王朝彻底退位，令民国卓立于世界之林，非辛亥革命一蹴而就，还得借助外力。

而那外力是宰相当国权倾一时的袁世凯。早在孙中山未归之前黄兴就以战时总司令的名义致信袁世凯，劝他反戈一击，“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即电告袁世凯，自己只是“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袁世凯果然以和平手段逼清宫退位，他也剪辮告别清廷；孙中山果然解职让位于袁世凯。此两者为中国历史上千古未有之盛事，仅此即足令孙、袁名垂青史。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词

三

孙中山奋斗三十年，十次起义前赴后继，结果只做了45天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就职，2月24日辞职），到4月1日正式解职，实际担当政务也只三个月。他的解职让位在革命党内部引起轩然大波，甚至有人自杀以表抗议。为安抚人心，孙中山慨然致电报章，公布自己的心声：

文等所求者，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创立中华民国也。清帝退位，民国统一，继此建设之事，自宜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项城以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功绩如是，何不可推诚？且总统不过国民公仆，当守宪法，从舆论。文前兹所誓于国民者，项城亦不能改。若在吾党，不必身揽政权，亦自有其天职，更不以名位而为本党进位之征。

此电内容丰富，最精彩的是给总统定位为“国民公仆”，其在法下而非法上；在法上者无法无天，在法下者则“当守宪法”且受舆论监督。这

大概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给最高行政长官定位。

“当守宪法”，那么宪法何在？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孙中山受过西方科学训练，深知法律对国家之生存、发展至关重要。他有道：“立国于大地，不可无法也。”“共和之根本在法律，而法律之命脉在国会。”在诸法中，他尤其重视宪法，认为“政治上的宪法就是支配人事的大机器，也是调和自由和专制的大机器”。宪法是“人民公意之表示”，是“国家之构成法，亦即人民权利之保障书”。基于此，孙中山就职伊始就主持将武昌革命军中央政府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订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除现代民主共和国所应有的主权、人权、政权、治权、疆土、法院，

以及模仿美制上下两院的国会等条文外，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临时政府模式由原定美国式的总统制，改成法国式的内阁制。约法规定，内阁总理直接向国会负责，变大总统为虚位元首。大致体现了分权制衡这一宪政精髓。此即近代中国第一部宪法，史称《民元约法》，1912年3月11日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布。

“当守宪法”之“当”，则见此乃中山及国人之愿望。然此后有谁破坏约法，解散国会就不得人心，有谁复辟称帝则更为国人所不容，就会有人以“约法”为旗帜与之抗争，甚至宣战。民初护国、护法之战皆因之而起。

辛亥革命老人吴玉章有言：“从前皇帝自称为天子，如果有人说皇帝是强盗，可以打倒，别人一定把他看作疯子。孙中山就曾经是一个被人家看做疯子的人。相反，在辛亥革命以后，如果有人想做皇帝或者拥护别人做皇帝，一定也被看做疯子。”这就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就是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这就是“民元约法”的权威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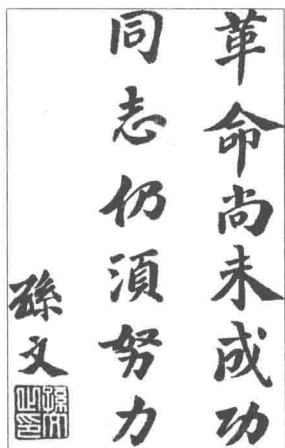
凝聚着民国志士仁人智慧与鲜血的“民元约法”，虽然没有阻挡住袁世凯称帝，也没有制止纷纭的“府院之争”，更没有平息南北干戈对

峙……但其至少制约了一些人的行为,成就了一些人的功绩,更重要的是标示着中国国体现代化的方向。即使袁世凯悍然称帝,也仅八十三天就在众叛亲离中宣布取消帝制,不久含恨而亡,临终托孤,其念念不忘的也是“约法”,遗书则期待“看中国再造共和”,并不像有的人真的是带着花岗岩头脑进棺材。尔后的总统其功过则皆以“再造共和”为见证。

四

遗憾的是“第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自己的建国学理由以美为师转向以俄为师,从以法治国转向了以党治国。其所谓的以党治国实则一党(即国民党)治国,非两党制或多党制;而且要全党附从他一人,说是“再举革命,非我不行”,“除我之外无革命之导师”,甚至连“附从总理”、“附从领袖”的提法都被否定。虽然他手订《中华革命党总章》也规定其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也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的日程,承诺终将还政于民,而其全过程都由国民党单独完成,说是“革命未成功时,要以党为生命;成功后,仍绝对用党来维持”。如此这般,孙中山自己就有违初衷,背离约法。于是“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将是党权至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从前争‘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所幸孙中山始终是个理想家,设计家,在野的批判家,不是实行家,只当过两任短暂的临时大总统、非常大总统,并未真正执政。如果他的革命方略付之实践也可能是如他所言“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当初民国的设计是要走向共和,实行宪政的,而任何形式的集权都不能称之为宪政。晚年走向以党治国,领袖至上的孙中山当与称帝的袁世凯有异曲同工之糟。诚如西哲所云:“不受限制的权力本身就是一个糟糕而危险的东西……无论它被称为人民还是国王,无论它被称为贵族政体还是民主政体,无论它被称为君主国还是共和国,我都会说,他播下了暴政的种子。”蒋介石接过这颗种子,经营了南京政府,终因“搞民主无量,搞独裁无胆”而败走台湾。孙中山未及料到和看到这种结局。1925年3月12日劳顿不堪的孙中山与世长辞,留下的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训,为“民国难建”作了注脚。

民国难建,原因太多,而朝野尤其是最高行政长官对国体模式的选择与实行关系尤大。就民国而言,其有多种选择,或欧美式之民治(法



孙中山遗训

制)、或苏俄式之党治、或日本式之君主立宪制。凡此种种,民国都不同程度地尝试过,民国总统也不同程度地为振兴中华做过努力,也各自有过不可抹煞的政绩。但民国尝试的种种外来国体模式都是焊接在中国三千年帝制传统模式的躯体上,都受到其严重侵染。“百代犹行秦法政。”毛泽东氏一言以蔽之,君主专制传统势力何其强大。民国以推翻帝制为宗旨,却免不了为之污染。不说别的,仅于总统之前加一个“大”字,即使是临时的或非常的也未幸免,就是世界奇闻,就是大中华脸谱的写照,这一中国特色何尝没有帝王意识潜伏其中。民国是啥模式都有点啥模式都不彻

底,故曰“四不像”。不过其主色调是中国特色与苏俄特色的混合体,尤其是南京政府,尽管蒋介石对苏联政权早有异议。

民国历史证明,选择(选举)总统固然重要,而调教总统则尤不可等闲视之,可是调教总统又谈何容易。中国传统意识往往将“成王败寇”延伸为“政治地位有多高水平就有多高”之定式。贵为总统,乃先知先觉,乃大彻大悟,乃真理化身,甚至被宗教神化,谁能调教,谁敢调教!除法律、时局、战争之外,古有王者师、言臣,今亦有诤友、诤臣如胡适。二十世纪30年代胡适反复呼吁,国民党废除党治,实行法治;抛弃专制,实行宪政,断定“今日党治的腐败,大半是由于没有合法的政敌的监督”,而“树立一个或多个竞争的政党正是改良国民党自身的最好方法”。指出国家领导人“必须是一国的领袖而不是一党一派的领袖”,“他的眼光必须超出党的利益之外,必须看到整个国家的利益。不能如此,决不够资格做一国的领袖”。作为一个“守法护宪的领袖”,他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最高领袖是“处高位”,他的任务是自居于无知,而以众人之所知为知;自处于无能,而以众人之所能为能;自安于无为,而以众人之所为为为。凡察察以为明,琐琐以为能,都不是做最高领袖之道。

胡适1932年11月在汉口第一次见到蒋介石,就郑重送上倡导无为

哲学的《淮南王书》，算是对“小事不能糊涂”的蒋介石的应时良药，结果却无异对牛弹琴。

总统不可调教，因而只能指望其自身的素质、教养与觉悟。民国总统之基本素质如何？总统素质令其在总统位上有何作为？且带来何种结局？其实有多种民国史与总统传记在论说着，奈何后见之明的种种著述或有为另一种意识形态改写、注水以至失真之嫌。天下何处有信史！

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看看总统们是怎么自说自话的。于是就有了这套《民国总统自叙丛书》。丛书首选了袁世凯（1859 - 1916）、黎元洪（1864 - 1928）、徐世昌（1855 - 1939）、段祺瑞（1865 - 1936），这四位故事较多而被研究较少的总统。他们四位都曾是前清之能臣，思想较为进步且多有作为。黎元洪、段祺瑞都是在张之洞、袁世凯以西法编练新军时崭露头角的军事人才，徐世昌虽为文人，也曾在小站新军中担任过要职。也就是说袁氏之外的三位总统，皆与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将之编为一套丛书，分则自成体系，合则有似民国编年实录。这四位前清能臣都当上了民国总统，本就有传奇色彩；而他们间分分合合的纠葛中插入南北对峙情节就更可观；此四位总统都属北洋，到1927年北伐战争则沦为“革命”对象，除袁世凯没有赶上此一幕，其他三位都是特殊“看客”，他们的观点当别有另一番滋味……

与我此前策划的《民国现场报导丛书》（出版时称为“可触摸的民国·现场”版）一样，请了四位少帅操刀，他们忙乎了一个暑假。今年暑假燥热无比，每部书又都是汗水泡出来的。尤其是徐世昌、段祺瑞之日记难以获读，无文献你无法代总统去自叙，其难度远超过当初的预想。不过，只要读者爱读且能从中获得有益的历史启示，我们也乐在其中了，而且尽可能将民国人物自叙系列丛书次第进行下去，以飨读者诸君。

于此还有句多余的话要说，凡人皆有虚荣心乃至自恋情结，总统或许更甚。因而别以为读了总统自叙就真的进入了历史现场。对总统尤须听其言，观其行，千万别让总统忽悠了。

2013年国庆于秦淮河畔

晚清以来，被当时的国人和后世所唾骂的人有很多，如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等。但印象中被国人骂得最多最狠的应该是袁世凯。无论是他所处的民国，还是到今天，袁世凯始终是近代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过程中负面形象的典型代表。卖国贼、窃国大盗、告密者等，袁世凯的这些头衔，一直写进了我们的教科书。

袁世凯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就是不得安宁的，经常有人跳出来骂他几句。1912年戴季陶曾在《民权报》上接连发表数十篇批判袁世凯的文章，如《胆大妄为之袁世凯》、《袁世凯罪状》、《讨袁世凯》。其中最有趣的是戴季陶的一篇署名为“天仇”的短文，题曰《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1913年章太炎坐着马车来到北京化石桥共和党总部大院，被软禁起来。当晚，章太炎一个人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就在墙壁上到处写上“袁贼”二字以泄愤。他觉得这样还不解恨，又用很多张纸写上斗大的一个“袁贼”字样，放在院子里焚烧。

北大百年第一骂人高手辜鸿铭，在晚清众多大人物中，最看不上、骂得最多的就是袁世凯。历史上有名的“四骂”仍然被人津津乐道。袁世凯和张之洞同在军机处时，有一次袁世凯对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此话传到辜鸿铭耳朵里，辜鸿铭愤然说：“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此为“一骂”。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辜鸿铭大骂：“袁世凯之行为，尚不如盗跖贼徒，其寡廉鲜耻无气义乃尔耳。”此为“二骂”。袁世凯知道辜鸿铭一直在辱骂自己，但迫于他的威望不敢拿他怎么样，于是希望能网罗到门下，没想到辜鸿铭说：“鄙人命不犹人，诚当见弃。然则汝两人者，一为土芥尚书，一为犬马状元乎！”此为“三骂”。最后一次是袁世凯死后，政府下令举哀三天，不得举行任何聚众娱乐活动，辜鸿铭却喜不自胜，竟然请来戏班，邀请外国友人，一起在家里看大戏。警察局一听是辜鸿铭家就打了退堂鼓。就这样，大戏连唱了三天。

但是，也有人对他评价很高，甚至认为他是近代历史第一人。晚清重臣李鸿章曾说：“袁公不但懂军事，而且熟悉外交，他胆略兼优，能持大

体。”孙中山在与袁世凯闹翻前也说：“袁公是很有肩膀的，是很喜欢办事的，民国现在很难得这么一个人，他是没有野心的。”“袁世凯真能办事，气度不凡，虽然习惯用权术，但也是迫于时势，不得不这样。”革命派重要人物黄兴说：“袁热心维持民国，实为今日第一人物。”历史学家唐德刚说：“袁世凯大小政务一把抓，事必躬亲，其为人，虽乏远大政治理想，然亦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不治私产，虽妻妾众多，然并不沉湎酒色，对诗词歌赋也颇能哼两句，但不搔首弄姿，以吟咏自傲，更不玩物丧志，收藏什么古董字画，品箫吹笛，风流自赏，平生所好，纵横捭阖。他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天才，对政治斗争，你死我活，处不稍让。”

国外媒体和官员对他的评价远远高过了国人的评价，袁世凯变得近乎“伟大”。《纽约时报》说：“袁世凯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人物，最接近伟大的人，他精力永远充沛，简直是健康和强壮的化身。”《泰晤士报》说：“袁世凯是中国的未来，他是伟大的爱国者。”《剑桥中华民国史》说：“袁世凯虽野心勃勃，但他并不狭隘自负，他不习惯阿谀谄媚，他的确残酷无情，为达政治目的而草菅人命，但与他共事的人都感觉他是亲切随和的。他历经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不但不倒，而且地位越来越高，可见他有抓住机遇的才能。”美国外交官马慕瑞说：“相较于同时代的国民党，袁世凯是一位敏锐、引人注目的外交官。”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自是五花八门，横看成岭侧成峰，很难有一个定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袁世凯从河南项城走出去，到北京私塾读书以博取功名而不中，后投靠吴长庆的幕府，进驻朝鲜，并得到李鸿章、奕劻等人的赏识，随后一直青云直上，盛极一时，说明袁世凯必然有着与众不同的才识和谋略。否则，在乱世英豪纷纷出没的时代，不至于李鸿章、奕劻、慈禧、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袁世凯，让他一直从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内阁总理、民国总统做到洪宪皇帝。当然，也一定是他做错了什么，从而遭到了历史的唾弃。他的戊戌告密、篡夺革命果实、暗杀宋教仁、签订二十一条、改制洪宪等，都成了骂他时的罪状。然而，这些事件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确切而公允的答案，直到今天史学界还在为此而争吵不休。正是这些不休的争吵，使得袁世凯还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们不时地总要把他拿出来翻晒下历史的灵魂。

一、奉使高丽，颇得人望

奉使朝鲜，成为袁世凯日后飞黄腾达的起点。这一段经历，常常被人们所忽略。似乎一提到袁世凯，人们能想到的就是小站练兵。然而，出使朝鲜才是袁世凯一生真正的转折点。1882年，朝鲜发生兵变，庆军首领吴长庆等受命率军东渡平乱。当时袁世凯随营负责庆军的军需供应和勘探行军路线。抵朝鲜后被任命为代理营官。接着又巧设计谋逮捕大院君并连夜将其押解到中国保定囚禁。由于他在平定“壬午兵变”过程中表现出色，吴长庆对他称赞有加：“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他在帮助朝鲜督练亲军和镇抚各军期间，因办事干练而赢得到朝鲜国王李熙的高度评价。1884年，朝鲜开化党在日本配合下发动政变，袁世凯当机立断，随机应变，一举摧毁开化党人的叛乱，巩固了清政府的“宗主国”地位。由于袁世凯足智多谋，刚毅果断，先后两次帮助朝鲜“勘定朝乱，厥功甚伟”，被清政府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他在驻使朝鲜期间，想方设法保全清政府在朝鲜的“‘上国’尊严和属邦体制”，基本上实现了“明尊亲之义，定摇惑之志”，朝鲜政局呈现出一种稳定状态。他在维护清王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方面的努力以及他表现出的那种驻外使节应有的果敢干练，赢得了朝野的一致好评。两代帝师翁同龢说他“奉使高丽，颇得人望”。更为重要的是，晚清重臣李鸿章对袁世凯的肯定，李鸿章说他是一位器识“深沉细密，历练和平，洵属体用兼备之才”。以此为契机，袁世凯逐渐走上了政治生涯的新起点，成为北洋军阀的始祖。

二、清末新政与袁世凯的作为

袁世凯是推动清末新政的重要人物，是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有功之臣。这一总体的评价应该是没有异议的。清朝末年的军事、警政、教育、宪政、实业等方面的巨大变革都与袁世凯密不可分。袁世凯还向朝廷提出了筹办新政的十条办法，包括整顿吏治、改革科举、振兴实业、增强军备等。他所任职的山东也成了全国最早推行新政的地区。光绪二十七年九月，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光绪二十八年五月，改实授，这成为他步入晚清政坛权力顶峰的起点。由此，袁世凯对新政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

袁世凯对于新政的主要贡献有：(1) 增练新军。自小站练兵到接掌北洋，袁世凯建立了中国近现代第一支新式军队，采纳西法编练新军，并与徐世昌等编就了《新建陆军兵略录存》、《训练操详晰图说》两部兵书。(2) 创办巡警。1902年，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期间，在直隶省城保定建立了巡警总局和分局，并参照外国拟定了中国最早的《警务章程》。1905年，清廷在北京、天津也建立了巡警制度。4年后，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了巡警。(3) 整顿吏治。他饬令各道府州县将所得陋规一律交公，酌给公费，以杜绝受贿，防止官吏贪污；设立官吏考验处，考核甄别初到和新选新补官员；设立调查处，关注舆论，了解官员政绩；设立法政学堂和胥吏学堂，以开“官智”，培养新政人才。(4) 改革教育。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袁世凯领衔，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等会衔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得到批准。清政府谕令从丙午(1906)科起，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试。这样，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为新式学校的发展扫除了障碍。(5) 振兴实业。直隶总督任上，袁世凯推行新政的主要成绩是支持创办实业、发展商业，创办直隶工艺总局，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有了长足发展，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的实业中心。袁世凯自己更是新式工业的直接投资者和参与者，他投资了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并拥有股票。1905年，他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近代著名的状元实业家张謇，曾和袁世凯有过长时间的龃龉，但在宣统二年(1910)参观了南洋劝业会上的直隶馆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颇觉袁为直督之能任事，此人毕竟与人不同，工艺殊有擅胜处，江苏不及也。”后来他在《自订年谱》中又一次提到了这件事：“观劝业会直隶馆，颇感袁世凯才调在诸督上。”

通过实施新政，特别是编练新军，袁世凯大力培植自己的势力，积累了日后重新崛起的最大资本。同时，袁世凯在新政中的表现，也使他赢得了立宪派的好感和信任，为他在辛亥革命中争取立宪派和旧官僚的支持奠定了基础。袁世凯在直隶推行的各种新政措施，使直隶成为“新政权輿之地”，为全国所瞩目。正因为如此，很多工商业者都把袁世凯视为自己的保护者。辛亥以后袁世凯能东山再起，一方面固然得力于他高超的政治手腕，另一方面也和他这一时期在实业界中的声望及由此得到众多实业家的拥戴有很大关系。

三、戊戌变法中袁世凯是否告密？

因为戊戌变法，袁世凯又多了四个字的评价：卖友求荣。传统说法都认为，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骗得光绪帝的信任，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势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于是，他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发。因为袁世凯的告密，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帝。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和梁启超的《戊戌政变纪事本末》都记载了戊戌变法的经过，不过两文有些不尽相同的地方。

但近几十年来，不少历史学家对此提出疑问，否定了因袁世凯告密导致慈禧政变之说，其理由如下：八月初六日慈禧实行政变时，如果是袁世凯告密导致政变，则政变上谕中必定指名捕拿谭嗣同，因谭是往说袁世凯围园劫持太后的人，属于“逆首”。慈禧太后绝不会放过他。何以上谕中只命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没有谭嗣同在内？而且上谕中康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罪名较轻。如果有围园劫太后之谋，则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上谕中，何以轻轻放过？还有，袁世凯在八月初五日上午觐见光绪后，即乘火车回天津，“抵津，日已落。”（袁世凯《戊戌日记》）袁赶到荣禄处告密，已在夜间，荣禄得知围园消息后，万难在当夜赶去北京，把消息反馈给太后。因为，当时北京、天津之间的火车，通行不久，只有白天行车，没有夜车，也缺乏夜间行车的设备、经验与技术。即使荣禄以直隶总督之尊也不可能下令加开一次夜车。荣禄于八月初五日夜间万万赶不到北京，而慈禧太后实行训政却在初六日上午，可见太后的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政变时还不知道康有为等有围园劫太后之谋。^①

因此，有人怀疑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并不可信：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西太后政变，而是西太后政变导致袁世凯告密。

四、袁世凯是否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1911年清王朝统治风雨飘摇，起用袁世凯的论调愈加高涨。内阁总理奕劻、协理徐世昌和那桐9月上奏辞职，希望袁氏出山掌政：“其才

^① 戴逸：《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胜臣等十倍，若蒙特予起用，必可宏济艰难。”武昌起义后，更多的人要求“启用袁世凯统兵平乱”。袁被当做清朝的救星，又致电又派人，催请他出山。为此，清廷从10月14日到26日连发七道谕旨。先任袁为湖广总督，再任命为钦差大臣，又任命为总理大臣，进京组阁，使载沣交权。同时袁世凯攻占汉口、汉阳，诱迫革命党停战议和，派唐绍仪跟南京临时政府谈判，达成以促清帝退位和效忠共和为条件选他当大总统的协议。于是袁和徐世昌等逼隆裕太后下诏，清帝逊位；孙中山同时辞职。1912年3月10日，袁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南北分裂结束。这段故事，以往史书一向记为袁氏“篡夺革命胜利果实”，袁世凯也因此多了一个头衔：窃国大盗。

关于袁世凯所以能从清廷的内阁总理摇身一变成为共和政体的总统，史学界在解此疑问时，不外两种说法：一是革命派的妥协让步说；二是阶级力量对比说。其中尤以第二种说法颇具说服力。毕竟，革命派的经济、军事等力量都比不上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清廷：双方兵力悬殊，革命派的军力只有8万，清军兵力总共有80万；双方装备差异较大，革命新军一般装备88式毛瑟枪和“汉阳造”，机关枪较少，火炮较为落后。清军不仅广泛地装备了德国98式步枪，而且配备了相当数量的马克辛重机枪与麦德森轻机枪。火炮也较为先进；经济上也有很多差距，革命政府新建，一无库存，二无可靠的经济来源，三无各省协款，只得以十分苛刻的条件向日本借款；当时清政府有一定的库存，且仍保有部分经济来源，包括“毫无限制地继续流入帝国金库”的关税。那么，袁世凯既然拥有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强大势力，何必要与革命派讨价还价的和谈呢？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各处通电到京”的共和主张刺激了袁世凯，使他受到了共和的舆论导向；二是革命党人许诺的拥戴大总统的承诺，为袁世凯“反叛满清、自立为王”提供了内在动力，满足了袁世凯的权利私欲。

因此，袁世凯由清廷内阁总理变为民国总统这一结果，不应简单地以窃国论处。其实这一过程体现了清政府的乏力、阶级力量的悬殊、革命派的特性和袁世凯的个人转变。换句通俗的话说就是，历史选择了袁世凯，袁世凯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只是袁世凯没有成为一心一意拥护共和的总统，这是历史的误会。